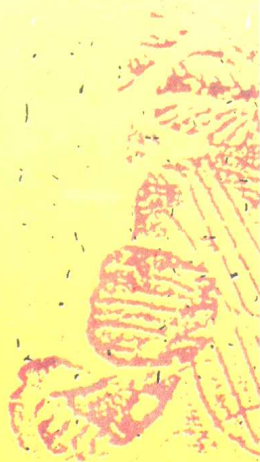


影响

中国历史进程  
的人物

上册





中国历史进程  
的人物



上



# 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

政治卷：主编 张大可

军事卷：主编 蓝永蔚

经济卷：主编 吴 慧

科技卷：主编 王渝生

文化卷：主编 刘志琴 唐宇元



海南出版社

琼新登字03号

**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

**张大可 等主编**

**责任编辑：唐亦安**

**特约编辑：郑一奇、薛京、潘平**

---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1 字数：991千字

1993年4月第一版 1993年4月第一次印刷

---

ISBN7—80590—280—1/K·14 精装(合卷)定价:29元  
简装(上、下)定价:25元

6020169  
29  
28

## 闲话英杰说沧桑(序论)

《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共分为五卷,即政治卷、军事卷、经济卷、文化卷、科技卷。这是一套从新的视角写的历史人物传记,分卷合册出版,实质是对中华民族历代有影响的人物的一个大略分类,便于读者寻绎观览,同时也是编者一种新视角的形象反映。全书所选近二百人,原则上以五千年文明史的古代中国为限。近现代中国,面对世界大潮,变化剧烈,英雄辈出,又贴近我们的生活,应当详加评说,我们拟议另出专书以充分反映时代精神。本书“政治卷”下及现代人物,正表明了这一意图。当然计划的实现还有待时日。本书所收人物,政治卷41人,军事卷33人,经济卷38人,文化卷47人,科技卷39人。下面将本书入选人物编纂大旨略述于次,以资读者参阅。

1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五千年文化,系统记载这一文化发展的就是卷帙浩繁的纪传体正史。我国历代蝉联而下的纪传史,积数有26种,4042卷,洋洋4500余万言,按各史的朝代序列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故学术界有“全史”之称,记事起于黄帝,讫于清末,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发展规模体制,载述毕于此编。纪传体正史是以人物为中心叙事,它创始于《史记》,帝王称“本纪”,人臣称“列传”。司马迁这一创造,活生生地展示了社会各色人物的活动,它不仅是历史内容的创新,而且也是历史方法的创新。从内容上说,《史记》人物传记,可以说是全方位干预社会生活的纪实文字,它既是历史,也是文学,所以内容丰富多采,引人入胜,读来扣人心弦。从方法论上说,以人为本位叙述历史,在古代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它至少是对神意史观的一种否定。总上两点,以人为本位叙述历史,生动活泼,说理形象,有血有肉,易于普及,启人深思,在今天仍有意义。本书的编纂,正是基于这一思考原则,

是不言而喻的。

2

历史人物有正面、有反面，他们都可说是英杰人物。古人云：才过百人谓之杰，智过万人谓之英（参阅《礼记·礼运》注及《淮南子·泰族训》）。无论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他们都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中国传统史学惩恶劝善，历史记载总以正面英雄为主。唐代史学家评论家刘知几做了如下的理论概括：

夫善人少而恶人多，其书名竹帛者，盖唯记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废而不载，余甚惧焉。”即其义也。至如四凶列于《尚书》，三叛见于《春秋》，西汉之记江充、石显，东京之载梁冀、董卓，此皆干纪乱常，存灭兴亡所系，既有关时政，故不可阙书。（《史通》卷八《人物》）。

可见惩恶劝善是我国古代史家的一个优秀传统。演说故事，反面人物的情节更为生动。惩恶劝善，不能不以正面人物为主。影响历史进程自然也是以正面人物为大。本书入选有反面人物，但仍以正面人物为主体内容，这不仅符合我们民族文化的传统，而且也是符合历史进程的。不过从辩证法的角度来审视，正面反面都不要绝对化。绝对化往往走向单一思维，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其实对于伟大的历史人物不能从简单的好坏二字定评，也不能搞什么三七开或四六开，而应当是功过毕书，留待读者去评说。古代的封建帝王，尤其是雄主，一般都是双重性格，简言之有大功亦有大过，或者说既伟大而又渺小。伟大是他的超人举动；渺小则是他有同凡人的血肉之躯的正常表现。由于环境地位不同，留下许多折光。所以我们要用多维思考去审视历史人物，既把握主流，也不要增饰或掩恶。这是本书力求要做到的一点。读者也应从这一原则在阅读中进行再创造，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不必求定论，不必求答案，方能获得更多的启迪。

何谓影响历史进程的人物？既不能简单加以定义，更不能以单一的标准去衡量。入选本书的人物，我们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其一，贡献大小；其二，口碑影响；其三，浩然精神；其四，创始影响；其五，警世取喻。贡献大小，不言而喻，这是最基本的原则。但就是这一最基本的原则，在理论上争议却最大。不同的历史观点对同一人事的看法却是天差地别。秦皇、汉武贡献最大，没有争议，而曹操的贡献就有争议了。李自成、洪秀全他们的贡献就更有争议了。这仅仅是就同一类型的人物比较。如果跨类来看，那就更成问题。发明造纸术的蔡伦，贡献是大还是小？如何把蔡伦与秦皇、汉武相提并论呢？从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变化来看，文化的积累，一代一代经验的沉淀，对于历史的影响无可估量。在这个意义上，蔡伦对于历史的贡献比任何帝王都要大。一般来说，帝王影响主要就是生前那么几年或几十年。他所建立的国家，缔造的制度，影响几百年或几千年者只是个别，而这一个别也就是某一个方面的相对立论。例如说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度影响中国两千年，也就是这样的相对意义。而科学技术的发明，可以有无限的影响，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几万年都无法作尺度。人类自从进入蒸气时代到电子时代，突飞猛进的速度何止是几百年几千年？当我们在电视机前看马戏团的动物作高难度动作表演，或看“动物世界”中大千世界的斗智斗勇，你是否曾想过，假如动物也有语言能够传递和积累一辈又一辈各别动物先辈的生活经验，我们人类还能主宰这个星球吗？成语中有“狼狽为奸”，那狼，那狈，无论多么狡狴，始终处于最原始的个体生态环境中，所以他们不能进步。人类如果没有语言，也许至今仍是处于原始状态。如果没有蔡伦发明造纸术来传播语言，打破时间、空间的界限，那么人类也许至今还是一个青铜与铁器的时代。因此，发明语言的，发明文字的，发明造纸的，发明印刷的，等等，而推及于一切科技、文化的发明者，创造者，他们的贡献都应大于帝王。本书入选了文化科技人物近半数，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光辉灿烂的时代，不仅有伟大的帝王，而且更有伟大的科技文化伟人。今日中国的落后，不

正是封建帝王们的阻滞文化科技而带来的吗？中华民族既有悠久的文明历史，必将有奋起之日，绝不逊于任何民族，而立于世界之林。我们正在奋起直追，缅怀先人，是可以受到鼓舞的。

历史人物，对于历史的贡献和影响是多侧面的。例如范蠡经商，过去只是把它作为隐身避祸的美谈，以今日观点来看，他应是追求个人价值的最大表现。当他在政治上不能发展，甚而有祸，于是功成身退，另谋出路。西汉留侯张良隐退避祸，导引辟谷，只不过是苟延天年，而范蠡则是另寻人生的创造，与张良不可同日而语。又如魏舒，正史没有他的传，打仗并无盖世功，但他创造步兵方阵的战法，带来了战争史的新时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也具有创始的意义。因此本书，入选了一些陌生的人物，他们都应当是不应被冷落的杰出人物。至于警世取喻，那些丑恶的宦官、奸贼等等反面人物，一定会给人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 4

以人物为中心、叙述历史，所选人物既是本身而又不是本身，它是各类人物的代表。司马迁首创人物传记，其所选人物皆为典型，组成一副推演历史兴亡的棋局，其入选人物皆各有旨归，而并非以地位资望为条件。本书 200 人，贯通五千年，每个人物都应放在这个大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这样就不会孤立地去评论人物的长短。因此对于每个人物的写法，不是记流水帐的功劳簿，而是取其一点、两点，足以表现他有别于他人的创造作特写。每个人物采用双重标题，副题在前，正题在后。正题一律标列本人姓名，以实人物的特征。副题举其常用的表字与徽号，加上一个历史烙印的定语，点示他的突出之点是什么！例如“千古帝王秦始皇”，这个副题包含“秦始皇”这个习见的皇帝称号，“千古帝王”这个定语揭示他所创制度贯通中国两千年。当然这个定语换一个角度标为“统一六国的”字样，那意义就小得多。正题就是“嬴政”，正题之下括说生卒。生卒展示时代，正题表示个体某某，副题在前标示某某在五千年文化史上的地位，独特贡献与影响。全书人物按时代为序。五卷只是五个大类。每一类可再分若干小类。例如“政治卷”有帝王、有女主、有宦官、有大臣、有农民起义首领等等不同



的地位与类型。帝王有的是创世主，有的是改革家，有的是雄主，有的是乱世魔王。读者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又如“文化卷”，有思想家，有文学家，有史学家，有文献学家，有宗教家等等。有的人物成就是多方面的。每一类别的人物，贯通起来能否勾勒历史线索。例如文学家，本书入选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苏轼、关汉卿、吴承恩、蒲松龄、曹雪芹，这些人物串起来大体可以代表我国古典文学的发展线索及高峰，余可类推。读者再从这个名单中进行增减，总数以200人为限，按每个读者的增减从200人的总数中减出去，那保留下来的人物，就是在读者心目中的百分比。每个读者都试试看，都来给本书打分。能保留120人就是60分，可以及格了。保留160人，得80分，已经是良好了。保留180人，得90分，那就是优秀了。百分之百的保留不可能。每一个读者的这种打分都是一家之言，本书编者作者也是一家之言。凡事都不要人云亦云，都来个一家之言，这就是创造。

传统的正史，即二十四史，贯通起来是一部人物传记通史。本书人物除个别外，皆选自正史，但打破各史的王朝体系，分卷组合以示其类。读者完全可以见智见仁地重新组合以观其类。分类是纵向看历史，按王朝体系来断代是横向看历史。实际上审视历史，一纵一横都不可偏废。本书纵中亦有横。从选目比例中可以体现出来。古代良史叙事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详近略远，二是详变略渐。最能反映历史变局的写法当然是详变略渐，即详变革之世而略升平之世。改朝换代的乱世，风云突变，无论是否变革制度，它总是历史的大变局，演化各种复杂的人世风云，更具有借鉴和思考的价值，理应为详。例如中国历史上的三国鼎立就是一个特殊变革的时代，大军阀、大奸臣、大谋略家、大命世之才都在这一时代展开。尽管三国鼎立时间短暂，而英雄辈出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时代，这也是《三国演义》这部演史小说做得好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本书入选三国人物也较多，正是用以体现详变略渐。尤其是较为敏感的政治人物，本书不以朝代的盛衰长短来决定去取，而以他的历史性创造为依据。例如齐宣王的尊重知识，张骞的凿空西域，梁武帝的佞

佛，他们遗留的影响打破了时空。其他人物不一一具述。下面对雄主、女主、宦官、农民起义这几个历来有争议的话题再闲话几句，以推其余。

5

何谓雄主，似乎没有人做过专门定义。大体说来，雄主必然武功卓著，或政绩辉煌，或锐意开拓，或宅心高远，他们主观都自命不凡、抱大有作为之志，怀利国济世之心，其业绩超卓前人至今为人们所称道。秦始皇统一中国于纷乱之际，明太祖创基业于草莱之中，汉武、康熙开拓疆界，平定“四夷”，唐太宗任贤纳谏，创“贞观之治”都常常为史家所论及。我们中国历史上的雄主，以这五位入选，不当有纷议。

雄略之主，所处时代不同，世情各异，因缘际会，演出了各别的生动活剧。而雄主的晚年又大多具有共性，都可以说是晚年的殊途同归。一曰好大喜功，老而愈甚。庸劣之主，不追求功业，也无所谓早期与晚年。英武之君则不然，他们总想立不世之勋，成尧舜之君，功垂千古，愈是晚年，愈是笃而弥坚。人到晚年，精力衰退，而头脑热度却在膨胀，既无往昔冷静分析的能力，也无当年叱咤风云的客观条件，只凭巨大的权力和主观愿望一意孤行，往往是好大而得小，喜功而无功，焉有不成悲剧之理。二曰迷信权力，高度集中。越是英主，其集权倾向越明显。三曰任用亲信，群小窃权。秦室末年有沙丘之变，汉武晚年有江充肆恶，唐太宗、明太祖、康熙帝的晚年都重蹈覆辙、无不在太子人选上生出事端。这都是表象。实质是雄主过分集权，以一人之力，办天下之事，纵然有三头六臂也无济于事，因此不得不假手亲近之臣。而一味顺从的阿谀人物，非愚则奸，而且大多是奸险小人。所以雄主愈是高度集权，而愈是旁落群小，总要演出各种悲剧。四曰猜忌贤能，杀逐重臣。这一点无须多说。雄主们的这种殊途同归，都不是他们的个人意志来决定的，也可说是他们意愿的反面。雄主们的共同趋向，乃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专制制度的权力结构是“人治”代替“法治”，帝王意志决定一切。愈是雄主，权力愈大，个人意志的东西就愈多。因此，无论他多么英明，主观上如何想治好天下，一旦身居权力顶峰，就难免不任

意使用权力。头脑一发热，是非就要颠倒。杀逐良辅，乃是为子孙清除“奸人”，安定江山；穷兵黩武，乃是“建不世之业”，不遗子孙忧”；任用群小，宦官，乃是亲信可靠，家奴易使。如此等等，雄主英年时的功业与晚年时的秽行就这样很不相称地由一人之手编写出来。

6

本书入选三位太后，即武则天，萧太后，慈禧太后，他们实际上都是女皇帝，其中武则天是真正的女皇帝，她称帝二十余年，建国号周。在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因此太后干政，可以说是政治上的女强人，他们做了那个时代不是女人应该做的事，也做了一般女人不能做的事。她们临朝称制，让堂堂须眉男子顶礼膜拜，山呼万岁，抖一抖女人颐指气使的威风，何等畅快！武则天则更是饱尝了坐龙椅的滋味，在封建社会，她们可谓是叛逆的女性。她们在权力欲的驱使下，成了向封建礼教的三纲五常挑战的急先锋。

女主干政在传统史家笔下意味着是女人乱政，这个案应不当翻过来？女人“半边天”，男子能干的事，女人也能做到，三位女皇的擅权，已经作出了历史的证明。男人能当皇帝，女人也能当皇帝，女人弄权丝毫不比男人逊色。在这个意义上，古代擅政太后毫无疑问是女豪杰。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用封建礼教束缚妇女，这是不公平的，应该批判的。从干政女主的种种作为，如萧太后之下嫁韩德让，武则天之专宠男色，足可以否定封建史家笔下列女传所颂贞节的虚伪！但这只是历史的一个侧面。从历史的另一侧面来看，正因为专制政体以男性一家一姓为中心，所以干政不是女人应做的事。因为女人不传代，女人当皇帝岂不与家天下的政体大相径庭！武则天就碰到了这个棘手问题，她最后不得不回到李氏的宗祠上来享受李姓子孙的血食香火。这就是说，在封建政体下女人干政是非法的。正由于此，女人要把非法变合法，她就要比男人付出更大的代价，玩弄权术也要比男人更要十倍、百倍地狡诈、凶残！而且女人凭藉的资本也有限，无不借用本人的天生丽质依附男人作祟，自然在其成功的道路上不能不付出损身损德的高昂代价。所以在

这些干政的女强人的观念上不知道德信义为何物，这也是客观的使然。再从政治斗争的实践来看，女人干政就意味着外戚专权，或男宠乱政，而这实质就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斗争，从而造成社会动乱。西汉的诸吕之变，北魏末年的河阴之役，继武则天之后的韦后乱政，西太后扼杀维新的戊戌政变，都是如此。唯一的武则天皇帝竟然被五王政变推下台来，得了现世报，岂非典型意义。这样看来，“牝鸡司晨，惟家之索”，也是一种历史的经验。所以汉武帝立太子刘弗陵，将其母赐死；北魏皇后生太子，最后都要被赐死，就是为了防止女人干政，避免导致外戚专权或男宠擅权，这都是大家所熟知的常识。这样看来，传统的某些史论观点，带有历史经验的凝结，未必容易翻转。

明白上述原因，就不难理解太后擅权一个个都十分残忍。西汉吕太后逼死自己的独生子汉惠帝；北魏胡太后毒杀了自己的儿子肃宗皇帝；武则天扼死自己的女儿，又杀了自己的儿子太子李贤；西太后也迫使自己的独生子同治皇帝早夭，又暧昧不明地害死自己亲手培养的大统继承人光绪皇帝；辽国萧太后之所以未杀害辽圣宗皇帝，是因圣宗自我韬晦，如同白痴，才免一死，实属万幸。女人干政，为了固权，不得不残害自己的骨肉，几乎具有共性，这一共性是值得发人深省的。而封建社会的女主干政与宦官擅权，无论怎么防范，而又总是一再重演。而一再重演的历史串起来就是规律。这个规律才是更值得研究，更值得深思的问题。

7

宦官制度的产生，要追溯于古代的官刑。何谓官刑？《白虎通》说：“女子淫，执置官中不得出。丈夫淫，割其势也。”淫指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势指男子的生殖器。《尚书·吕刑》把对女子的官刑称作“椽刑”。“椽”是用木棍击刺女子下身，破坏性功能。这说明，最早的官刑，对女子亦施肉刑，后来才改为幽闭。据历史考察，官刑产生于传说的尧舜时代。当时正是母系氏族向父系一夫一妻制的过渡时期。官刑的目的是不允许淫乱之人“谬种”流传，即不允许有后代。这样，官刑就带来了副产品：男子被割势，丧失性功能，为尔后王权的宫廷制度所利用，于是产生了宦官

制度。

何谓宦官？宦官之名，产生于春秋战国之时。当时天文学已经很发达。人们观察星空，为了区别星座，给星星取名字。人间帝王称天子，人民都是上帝创造的。孟子就说：天生众民，然后天又为管理人民降生了君王和老师。统治者用天命来加强统治地位，于是把人间制度搬到天上，把星空赋予大一统社会的等级名称。所以天文学又称天官学。“宦”就是一个星座的名称，在帝星之侧。因此侍奉帝王的家奴即在帝侧，故而被称为宦官。

历史记载有名有姓的先秦宦官，春秋时齐国有竖刁，晋国有寺人披，楚国有管苏，宋国有伊戾等。这些宦官参与了政治。寺人披告密救了晋文公，管苏谏楚共王，是两个比较好的宦官。竖刁乱齐，伊戾祸宋，是两个坏的宦官。

大规模的宦官是秦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以后产生的。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皇帝权力至高无上，大修官室，在全国范围选美。皇宫中的嫔妃女仆，少者数千，多者上万。管理皇宫，维护官室，都需要大批的宦官，少者几百人，多者数千人。宦官人数众多，本身成为宦署衙门，等级森严。秦汉宦官有“中书谒者”、“中黄门”、“中常侍”等，隶属九卿之一少府统管。隋、唐、宋几代宦官属内侍省。上层宦官又称太监。明代宦官机构更大，设有十二监、四司、八局。统称二十四衙门。宦官提督东厂、西厂、锦衣卫等特务机构。清代大小宦官统称太监。清朝覆灭，结束了宦官制度。伪满州国建立，宦官又死灰复燃。1945年，伪满州国被推翻，宦官才随着中国末代皇帝的新生，最后退出了历史舞台。由此可见，宦官这一丑恶陋习，是封建王朝制度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只要有皇权，就有宦官。即使是末代皇帝，也必有宦官。可以说，宦官是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我们研究历史，深入认识封建专制制度，研究宦官历史是一个重要的侧面。许多头面宦官人物影响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说到宦官的作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宦官是中国封建集权制度的肿瘤。宦官始终伴随着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而周期性地为

祸社会，流毒全国，给当时的政治带来危害，给当时人民带来灾难。当然，在宦官中也不乏个别的有识之士和杰出人物。在秦国发展史上有推荐商鞅变法的伯乐式宦官景监；西汉有大音乐家宦官李延年；东汉有经学家宦官郑众、改进造纸术的宦官蔡伦、支持清流派朝官与乱政的十常侍作斗争的宦官吕强；五代时后唐宦官张承业是一个辅弼贤臣；北宋宦官多有功于边陲，张崇贵、王中正、李宪都建功于西北，还有水利专家程昉；明代有航海家郑和，他七次下西洋的壮举和赫赫功业，更是青史垂名，光照千古。但从宦官的总体来看，他们的本质是皇帝的家奴，这一历史地位决定了宦官奴性十足。宦官本身也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宦官的下层更遭受多重压迫。入官为宦官的人，情况也极为复杂。不少人怀有野心，自阉入官，此类宦官既有野心，亦善权术，擅权乱政者即此类。更多的人是家贫为阉夺，或犯罪被阉发落为宦官。在乱世时代，战俘年轻秀俊者有许多被处置为宦官。所以被迫为宦官的人，其遭遇本是可怜可悯。例如西汉伟大史家学司马迁就因祸被阉，汉武帝用为中谒者令，被司马迁视为奇耻大辱。百分七、八十的宦官都是自幼被阉，他们作为刑余之人，身心遭受了严重的摧残，发生心理变态，已不是个完整的人。由于宦官处在深宫之中，目睹皇上和嫔妃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和不可一世的权势，日久天长，怎不染上权力之欲。皇室生活奢侈，使宦竖们不知稼穡之艰难，他们那能体恤人民疾苦，以治国为怀。阉宦大多不知书，如明代大宦官魏忠贤就目不识丁。在这种氛围之下的宦官，一旦擅权，十之八、九皆为祸患。所以，个别宦官的贤明，不能改变整体宦官的卑污。宦官的身份是奴才，他们不能掌权，所以擅权宦官都是假借皇权以肆虐，如同狗仗人势。宦官的奴性与狗性，决定了擅权宦官均为小人之态，得志便猖狂，因此无法为宦官政治唱赞歌。秦王朝的赵高和明王朝的魏忠贤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

8

有一种史学观点认为，在阶级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就是阶级斗争，而在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就是农民战争。中国封建社会爆发了大大小小数百次农

民战争，它不但没有把中国封建社会推进到资本主义，倒是锻炼了中国封建社会更加专制和稳固，使它百炼成钢。农民战争规模一次比一次威武雄壮，中国封建王朝专制政体则愈来愈固若金汤，形成了恶性循环。他们争辩说：农民战争瓦解了旧王朝，扫荡了大批地主阶级分子，使封建社会的锁链松弛，从而推进了社会向前发展。因此，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过后就要出现一个新兴的封建王朝，带来短暂的太平盛世。但无情的历史事实确也证明了：军阀混战，腐朽王朝的内部倾轧演成的动乱，也照样瓦解旧王朝，扫荡腐朽势力。至于说到对生产力的破坏，无论农民战争，还是军阀混战都是一样的。盛大的汉王朝与唐王朝不仅从秦末农民战争和隋末农民战争吸取教训；也同时从秦朝的覆亡和隋王朝的覆亡中吸取经验教训。如果说前一个教训是正面的，那么后一个教训则是反面的。也就是说亡国之君也是值得辩论的课题。历史就是这样的复杂，他决不是某种单一力量的推动，而是由多种合力推动向前发展的。本书入选陈胜为农民战争的典型人物，他是反暴政的英雄；同时选了隋炀帝这一亡国之君也是一个典型人物，他是施暴的。这样一正一反，对照阅读，必能开阔眼界，不为板块理论遮目。

9

“历史研究必须为现实服务”，这是被许多人曲解了的一个口号。其实这也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秀传统。孔子修《春秋》目的在于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使乱臣贼子惧。司马迁作《史记》，为的是“志古自镜”。司马光修编年史，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刘知几在《史通》中说：《史记》、《汉书》被目为五经之亚。历代封建王朝十分重视修史。宫廷有女官写帝王起居注，朝廷有史馆修实录，修前代历史，地方修方志。这是因为历史有资于借鉴，这是它不可磨灭的价值。

历史与现实，这两者是对立的统一，二者互为因果，互相渗透，互相影响。过去的历史包含着产生现实的条件，而现实不仅烙有过去历史的痕迹，而且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李大钊说过：“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李大钊选集》第99页）。换句话说，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转化为历

史。但并不是说，历史就是现实，现实就是历史。“四人帮”搞“影射史学”混为一谈，失足在此。他们讲“儒法斗争”，讲“两条路线”，用历史来图解现实，说什么全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儒法斗争的历史，儒法贯通古今，秦始皇是大法家，秦始皇的暴虐不能批判；相反的“愈是清官愈要批判”，真是荒谬之极。现实的颠倒，导致了历史的颠倒。否定历史与现实的差别，如同割断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一样，同样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历史的发展，不仅有形式上时间的区分，而且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这些不同的具体内容构成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历史的阶段性反映了历史与现实的差别。因此，我们讲历史与现实，既不能割断二者的联系，也不能混同二者。割断了联系，就不懂得历史的借鉴；混同二者，就会把历史变成对现实的图解。两种偏向都是不正确的。如果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重要的是实践。本书就是一个实践，是是非非、就留给读者去评说吧！

编 者



## 内容简介

本书视角独特、读来令人兴味无穷。

生前显赫，死后可能默默无闻。

生前无名，死后可能流芳百世。

要知道历史人物影响历史进程的独特方式、

影响程度，请阅读本书。



政治卷：主编 张大可

军事卷：主编 蓝永蔚

经济卷：主编 吴慧

科技卷：主编 王渝生

文化卷：主编 刘志琴 唐宇元

ISBN 7-80590-280-1/K·14 定价：二十五元